

COMPARE THE ... ROYAL

PRODUCE *BETTER TYPING*

EASIER, FASTER



LETTER-PERFECT

Typing

JUST a glance at a Royal-Written letter!

There's the answer! Right before you. Every line is a reason why you should replace your present typewriters with Easy-Writing Royals. Absolute uniformity—every word clear-cut—every paragraph perfectly aligned and spaced.

Yet this is not all. Royal's amazing superiority is similarly evident in its greater number of perfect carbon copies,

its sharper stencils, its facility for work.

For the Royal is an all-around purpose typewriter—equally efficient in manifolding, stencil- and tabulating as it is in the production of correspondence.

An advanced typewriter—advanced i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the Easy-Writing Royal permits the operator to do her best work and, without extra effort, to type far more in less time.

THE *EASY-WRITING* ROYAL

序

根據咸豐八年的中俄璦琿條約及咸豐十年的中俄北京條約，帝俄得了黑龍江以北及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包括海參崴在內。於是俄國遂成了北太平洋的大強權，引起遠東局勢的不安。各國的政治家，尤其是英、日兩國的政治家，深恐俄國要繼續向南發展。實際上，在甲午以前，俄國在遠東的勢力尙是潛伏的。那時西比利亞的鐵路尙未建築，俄國的精力又似乎集中於中央亞細亞及巴爾幹半島。所以那時俄國在遠東雖有各種企圖的試探，尤其在高麗，并未採取積極政策。但基本形勢已成立，日後的衝突已下種。

甲午以後，俄國就積極了。促進的因素有幾種：第一、中國的積弱暴露了，世人均以爲瓜分之期已到了。第二、日本獨佔高麗，在亞洲大陸上得了根據地。馬關條約又顯示日本野心之大。第三、俄國在甲午前後正修西比利亞鐵路。那條路固然是世界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情，也是國際政治的大變遷。第四、俄國國內適於是時有少數輕舉妄動的少壯野心家，得了尼古拉二世的信任。這幾種因素演出了一個大悲劇，其最後一幕是一九零七年的日俄妥協。

這本書就是研究這個大悲劇的。著者在立論方面頗有偏激之處，如批評俄國財政部長維特。維特的自傳固然有不少粉飾之處，但在日俄戰爭以前的兩年，他已不當權，那兩年內俄國在東北的政策是他所反對的。著者把日俄戰爭的主要責任歸在維特身上似乎太偏了。同時著者所用的材料幾全是俄國方面的。所謂滿洲問題是個

多面的問題。他方的材料，尤其是中日兩方的材料，如不利用，那事情的真相就不容易得見了。

上面所提出的兩種批評不過是這書美中之不足。根本上，這本書是研究近代遠東問題的人必不可少之書。俄國是前文所謂大悲劇中的主角。他是上次日俄戰爭的禍首。俄國方面是什麼人在那裏策動；他們是怎樣打算的；他們用的手段怎樣；反對他們的是什麼人；為什麼反對；這些問題均是這段歷史中的主要問題。著者或是替我們解答了，或是供給了我們必須的材料，以便我們自己去解答。著者不但利用了俄國外部的祕檔，並且利用了俄國財部的祕檔。後者尤為可貴，因為西比亞及中東鐵路的建築均由財部主持；中俄的交涉，在俄國方面也是由財長維特主持的。現在我國學術界能有此書的譯本，這是我們的大幸。此段歷史的研究，因有此書，必能有很大的進展。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蔣廷黻

序言

我從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六年曾發表了許多論文以論述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之俄國遠東政策，後來我又打算把這些文字收攏來作一個論文集，本書即從此原來的論文集演變來的。本書之緒論及一二兩章本早已寫好了，因為後來要出論文集，所以又把他改作一次以應新版（註一）。這時雖然有許多補充更改的地方，但究竟沒有破壞原來的規模，不過增加了論文集的篇幅而已。等進行到第三章，就知道我這種辦法行不通了。我從一九二七年後因從事於更縝密的研究而搜集了許多新材料，這些新材料萬難強納於舊論文之間架中，因此使我不得不重新寫作更詳細的論文。等到第三章寫成時，竟大大超過了原計劃的篇幅。這時就生出了兩種必要，或是完全停止此後工作而以不完備的舊文付印，或是繼續進行作一完備的研究。可惜在寫第三章的時候把前十二頁的材料都弄零散了（因受技術條件的限制），所以決定積極地進行工作時，我已沒有重寫緒論與第一、第二兩章的可能，這幾篇原是為論文集而寫的。從第三章到第八章全是重新作過的。

現在與世人相見的「史綱」就是如此產生的。他只把目次中所包含的題目統一起來。他所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帝俄十五年外交政策史中的一個問題。但九十年代及二十世紀初年，俄羅斯帝國之極積政策正是向着滿洲而且主要地是向着滿洲，這政策決定了日俄衝突的發展，這政策增加了國際情況的紛亂（這種情況非常助長了戰爭之生長），最後，這政策斷絕了俄國政府在世界帝國主義衝突中之擒縱的自由，而經過戰爭與一九〇

五年革命之後這政策又把俄國拉進了協約國，於是，專制政府就遇到了一九一七年的死滅。因此，我認爲，我對我的研究之題目以及年代之限制並未破壞了本大綱之完整性，亦未減少了本大綱之意義。在這裏，我希望這大綱能與俄羅斯帝國主義之總問題發生關係——俄羅斯帝國主義之問題正是目前歷史界之中心問題。我把帝國主義時期之帝國外交選來作我專門研究之對象，但我在特殊的研究中也注意了一般的問題，我也參考了保克羅夫斯基及其學派之著作中之各種定論。我在一步一步地追尋俄國外交家之活動，我的主要任務爲研究他們所支配的方法與工具，爲研究他們圖謀實現的政綱，爲研究那些能够影響此政綱底發展之各種動力，爲研究專制政府上層機關中之鬭爭（實爲解體）——愈接近於戰爭，這種鬭爭或解體亦愈強烈。我在研究中也看到了，獨占時期資本主義發展之全部條件已爲專制政府造成了一些矛盾。我在十分細心地研究了俄國政府外交部所積存的檔案之後，我就觀察到，專制政府不僅企圖適應這些條件，並企圖投身於這些條件的發展中以佔取某種地位，並利用此地位以保障其國內統治權及更進而與列強並駕以自由活動於帝國主義底國際舞臺上。我這種觀察主要地是實施在這個舞臺遠東部份之滿洲一角上並用最精確的筆墨申述於我的大綱中。

我不敢說我的觀察已甚完備，即於我所看到的材料的範圍之內我也不敢這樣說。凡是根據檔案文件以研究最近歷史的人都知道，這些檔案之數量與情形給研究者幾多的困難！本書所根據者大都是財政部總務廳第三科的文件。這第三科成立於一八九五年，即當修築西伯利亞鐵路外貝加爾段以穿過滿洲之問題發生的時候，但他不久即變成了財政大臣之外交廳。此外，我在別處也找到很多很有價值的材料（註二）。但因爲受了外部條

件的影響使我不能如我所希望者以盡量利用莫斯科所積存的外交部檔案。在財政、外交兩部的檔案不能同等利用時，我覺得能多用財政部的檔案還算對本書較有利些。我所研究的那幾年剛剛就是維特當政的那幾年，那幾年中，財政大臣對於俄國遠東政策之方針以及對於遠東外交之活動皆有決定的作用。因此，要研究那時專制政府之經濟政策在俄國之國際關係中用什麼方法以何種程度而選定並解決了他的任務，就不能到外交部去找基本材料。而且外交部也會把很多文件（本部的及外來的）的副本送交財政部。自一九〇〇年之後，當拉姆斯道夫作外交大臣的時候，外交部差不多變成了一個隸屬機關，他不得到財政大臣的同意時就不敢在遠東採取任何步驟。而財政大臣則在遠東支配着自己的偵察與執行機關，並支配東清鐵路與華俄道勝銀行之一切機關。

滿洲一段歷史與維特之名字密切相連，所以我進了他的遠東政策之實驗室後，就很容易建立並確定我這個研究之見長方面。我根據下面的理由來估量維特之重要意義。維特是資本主義營陣之逃脫者，這種情形再加上他經驗與天才造成了他在亞歷山大第三政府中之卓絕的地位，使他比較別人更適宜於作專制政府適應新條件之執行者。他先作了一個最大而收益最多的鐵路股份公司之經理，後來在全俄範圍內又作了鐵路經濟政策之主宰，所以當他穿上大臣的制服時，他就包攬了那把俄國資本主義的版圖擴展到全西伯利亞之偉大計劃之草創與實現。這個計劃從開始即吸引維特去干涉俄國的對外政策，後來更是逐日加強此種吸引。維特之「包辦」慾並不像他的同代人所思想者，即不僅是他個人天性的表現，而是草創新政策之客觀要求所養成。這新政策

在國內，希望能在資本主義之瘋狂的發展中保障專制政府之領導地位，並能在外部帝國主義之環境中取得市場。在九十年代之繁榮與國際範圍中帝國主義之急進政策兩個條件之下，維特的干涉是順利，俄國遠東積極政策即越能依靠聖彼得堡以與財政資本作更密切的聯盟。國際銀行，第一個就是華俄道勝銀行及與該銀行並生的東清鐵路公司，外加上滿洲境上的私人工業，這些東西都答應受財政部的支配。國庫對於這個銀行、鐵路、汽船、礦業的複合事業的參加愈多，滿洲開發之私人企業在一九〇〇年恐慌的條件就愈近絕望之途，這個政策的獨占性也就愈加深刻，而這個政策也就因其獨占性而對滿洲愈加薰染了戰鬪性，而且把這戰鬪性一直保持到戰爭爆發的時候。這時的維特，一方面是俄國的財政大臣，另一方面又是他所指揮的托拉斯之政治指導者，所以就成了這個政策之鼓吹者；因此，他在活着的時候就運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在死後就用他的「回憶錄」以促成一種神話的製造與廣佈，好像他的政策是絕對「和平的」。這個神話雖然無稽，但直到現在還是很活躍，想要打破這個神話，還需要對此政策之每一步驟與每一曲折作詳細的專門的研究。我正是以此種研究為任務，我在財政大臣外交廳之原本檔案中找到了最可靠的細小材料。我盡可能地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小材料，並明明白白地揭破帝國主義時期皇帝「忠僕」所宣佈的政策之真實性質與實際意義。

在本書出版時不能不致謝於出版該書之葉奴克茲東方研究院的當局。我之能利用本書所根據之各種文件並利用到底，就不能不感謝莫斯科中央檔案局與列寧格拉中央歷史檔案局之經常的優待。說到本書原稿之

最後完成，我就不能不感謝普列斯尼雅柯夫先生，他曾把原稿中的本書校讀了一遍。

書尾附有滿洲地圖，其中注有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在滿洲所成立的或計劃成立的一切工業、林業與鐵路的租借。在畫這張地圖時，柯柏羅瓦幫了我很大的忙。

作者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

(註一) 緒論由一篇短文改作而成，文名「俄國遠東政策之基點」，發表於一九二六年「西伯利亞之火」雜誌第四期上。第一、第二兩章爲論「李鴻章基金」一文中所抽出的幾節之擴充，這篇論文曾發表於「階級鬭爭」雜誌一九二四年一、二兩期之合刊上，在從七十七到一百一十之諸頁上。

(註二) 在本書引證檔案時，凡標明財政部檔案第幾號者這就表示這些材料由財政部總務廳第三科來的。如無號碼，即表示是來自列甯格勒中央歷史檔案局。來自莫斯科的材料皆明白註出了。

譯例

(一) 譯者但求忠實，故文字或不通暢。

(二) 俄國舊曆與西歐各國通行之曆相差十三日，所以外交文件常常註明兩個日期。然文中引證亦有只註一個日期者。如係國內文件祇註某日而不言公曆，俄曆者則為俄國舊曆，如係國際文件或外國文件則為公曆。

(三) 俄國之度量衡及貨幣單位皆不與西歐同，文中只言俄里、俄文等而未註明國際度量衡之等量，故於書末附一表以說明之。

(四) 書中凡日本人名皆多方覓出漢字，然 *Sutemi* 及 *Lutsai* 二字卻找不出。*Sutemi* 譯為須出不妥，*Lutsai* 就乾脆書為英文而不寫漢字了。

(五) 朝鮮、日本及中國之地名之翻譯大都無誤。然朝鮮之 *Sonchenpoo* 譯為松珍浦，奉天 *Mamoholo* 譯為馬目火羅恐不甚妥。姑誌之以待後日之更正。

(六) 書中所引之材料大都採自俄國財政部檔案及赤檔雜誌與 *Die Grosse Politik des Europäischen Kabinet* 三種史料，俄財部檔案中國自然沒有，赤檔雜誌與 *Die Grosse Politik* 中國大圖書中間或有之。

目次

緒論	自一八九二至一九一七年俄羅斯遠東政策之基點	一
第一章	滿洲問題之發生	二九
第二章	俄國對滿洲之「和平的」侵略	六八
第三章	南滿之侵奪	一〇八
第四章	退回長城以北之失策	一七七
第五章	全滿洲之臨時佔領	二〇四
第六章	日俄戰前之種種	三〇五
第七章	日俄戰爭中俄國之國際財政關係	四一二
第八章	戰後滿洲之經營	四八〇
俄英中人名對照表		

帝俄侵略滿洲史

緒論 自一八九二至一九一七年俄羅斯遠東政策之基點

俄羅斯帝國國際關係史中之滿洲問題自一八九五年之後纔生長成爲國際問題而佔據了第一等的與戰鬪的地位，而且在最近的一秩中經常地作了俄國外交政策之根本問題。他之佔得這種地位直接而且單單是由於西伯利亞大鐵路之準備修築，這條鐵路切實地改變了日本海邊俄國積極政策之速率與規模。不論爲什麼修築這條鐵路，不論他是應了什麼要求與利益，他總是俄國外交政策之基本事實。這個政策此後各種事實都接二連三地來了。俄國本來久已打算用鐵路把廣大的西伯利亞區與中部俄羅斯連接起來，在經過許多曲折進退之後，到了一八九二年，就形成了打破世界紀錄的（七千多俄里的），直達海參崴的，寬軌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之建築計劃，不僅正式決定了他，而且確定了他的執行期限，並在技術上與財政上都有了精密的規畫。從此之後，這些事實即越發猛進而不可阻止。這樣的計劃不祇是國內鐵路週轉之擴大，不僅是西伯利亞個別商業中心之有利於商業的連接，而且已取得了世界的意義。俄羅斯已把鐵路之一端插入太平洋岸上經濟的與政治的國際競爭之範圍，他希望這條路線所造成的「歐亞交通方向之轉變能有利於俄國」。官方宣佈西伯利亞鐵路爲「世界

的事件」，「他在世界史中開關了一個新時代，他必然要促成國際經濟關係之根本的改變」，他被看作太平洋上俄羅斯艦隊擴充之手段，他能使俄國「控制太平洋上一切國際商業運動」（註一）。

還有個問題。當時財政大臣維特在報告中所熱烈申述的計劃好像是在一八九一年廣佈於歐俄的大荒年的直接印象之下草成的，而其最近數年之執行之負擔者又是俄國的農民。而又是準備一條捷徑以便於農民因饑饉與無地而逃亡到那無人煙的西伯利亞。要知道和平的經濟力量之複雜的綜合中也會有革命的作用，所以這條鐵路在國內階級關係的發展上也有意義，他又像一根皮帶一樣把這個國家與世界帝國主義的機構在遠東連接起來。在這裏有決定作用的外部事實（一九〇四——五年的日俄戰爭）未被想到。西伯利亞的水道與郵政系統對俄國也有重大作用。維特在一八九二年所提出的「控制太平洋上一切國際商業運動」的口號還包括另一綱領，他推動俄國把西伯利亞大鐵路穿進滿洲兩千餘俄里，這樣就促成了俄、日間帝國主義衝突之軍事結果之成熟。

俄國對日戰爭之失敗並未把他驅出滿洲。他只在那裏縮小了他的勢力範圍（對日讓步），而俄國勢力之傳導者，經過北滿直達海參崴的東清鐵路之幹線依然是在俄國手中。誠然，尼古刺政府直到大戰時還在堅決執行的對滿獨占政策現在已遭了完全的失敗而沒有了，在戰後與革命後的新局勢之下滿洲問題已失去了尖刻性與直接戰鬪性。但北滿之廣泛的鐵路租借，鐵路附屬地及許多生長着的城鎮以及根據一八九六年租借條約之俄國管理權（不論戰後俄國是弱了好多）對中國總是一種威脅，遲早北滿要脫離中國的威脅。此後自一九

○七到一九一六諸年中，俄、日協定把前此不久的仇敵拉進了圖謀瓜分中國的軍事同盟中。只有俄國的十月革命纔完全取消了對中國之或明或暗的侵略威脅。在前一時代中，俄國對東亞市場之「和平的爭取」政綱都與此侵略威脅有關係，而維特之政策又把這政綱加上了更多的對滿洲三省之戰鬪性。

中國與俄國（十七世紀）及西歐（十六世紀）之商業關係本已甚久，但就現代字義上來講，中國「開門」以迎外國資本實是一八四二——四四年後的事。那時曾「爲着鴉片」而發生中英戰爭（一八三九——四二年），結果中國被迫而開放五個口岸以迎歐洲商業，並規定了各貨一律的百分之五的關稅，又承認了英國人的治外法權（後來一八四四年法、美兩國人也取得了治外法權）。據一八四四年的統計看來，歐洲之對華貿易，輸入中國者爲二萬八千萬元，由中國輸出者爲三萬三千萬元。各國之百分比，輸入方面，英佔百分之六十八，俄佔百分之十九，美佔百分之七，其他國家（荷蘭、葡萄牙、法國、丹麥、比利時、瑞典、德國）佔百分之六。輸出方面，英佔百分之六十，俄佔百分之十六，美佔百分之二十，其他國家佔百分之四（註二）。我們應注意到，那時俄國的商業都集中在恰克圖，而且都是經由中俄邊境上的陸路轉運，並且在最後一秩中還有降落的傾向（註三），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本部（十八省）差不多完全是英國資本的勢力範圍（美國資本是個微弱的同伴）。

在此後大清帝國之經濟的分割以及政治的領土的分割中英國獨占的地位就日漸減少了。從一八五八

——六〇年中，英二次戰爭之後，英國即取得了海關中總稅務司的地位，而以英人赫德充之，一八九八年又以條約規定，在英國對華貿易超過一切國家時，英國可永保此稅務司的地位。英國於十九世紀下半期對中國所採用的軍事侵略引起了很多國家在中國邊陲上攘奪土地：俄國搶去了阿穆爾省（一八五八）與沿海省（一八六〇）及伊犁之西部（一八八一），法國搶去了下交趾（一八六二）與安南（一八七四），日本搶去了琉球羣島（一八七九——一八八一），英國自己搶了緬甸及哲孟雄（一八九〇）。這些攘奪還沒有引起了攘奪者之間的衝突。但這些攘奪實在是他們侵入中國內部的起點（註四）。

到了九十年代，朝鮮就成了帝國主義先鋒們之接觸點。朝鮮本來已作了多年的中國屬國，因中國想避免對日糾紛與衝突，所以允許日本與朝鮮直接訂約如對獨立國一樣（一八七六），後來不僅不阻止，甚至鼓動朝鮮去同西方各國直接締結相似的條約，欲以此方法阻止日本勢力侵入漢城王宮（一八七九）。美國自七十年代之初即欲侵入朝鮮，所以就首先利用了中國這種態度。一八八二年的美韓條約領起了西歐國家之相似的外交行動（英、德在一八八三年十一月，意大利與俄國在一八八四年六月，法國在一八八六年六月）。這種以國際勢力的交錯來保障朝鮮的政策成立並公佈於一八八三年。那時曾任德國駐華領事的莫命道夫正在作朝鮮的海關監督與經濟顧問。他在那個時候就把他這個「新祖國」的外交政策轉向於聯俄。莫命道夫的計劃想預防日本二次干涉漢城（一八八二年事件）的可能，他的辦法是聘請俄人到朝鮮軍隊中作教官，並以不凍港拉薩列夫港送與俄國，這計劃引起了英國的反對，那時英國已經佔取朝鮮海峽出口處的巨文島。那時俄國深懼發生海

上衝突，怕在遠東海面造成一個達坦尼第二，所以這計劃就流產了。中日軍隊的第二次漢城衝突（一八八四）使中國與日本暫時妥協，商定中日兩國如不互相通知皆不得派兵至朝鮮（一八八五）。在那種情形之下，在此後數年中，中國正仗着英國的協助，經過赫德，決然地執行一種政策以求把朝鮮的海關隸屬於中國海關的系統之下，絕不願放棄其在朝鮮的權利；日本呢，因為在朝鮮的商業中佔着第一位，所以想把中國人排擠出去而宣佈朝鮮之正式獨立；美國乾脆不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俄國完全自知其在遠東之「歷史的使命」，正打算用鐵路把沿海省與中央聯接起來（在開始時用水路、鐵路的混合交通亦未嘗不可）——在這種局勢下面，可以說一八八五年的中日條約沒有把那複雜的朝鮮問題解決了絲毫（註五）。

這時，俄國政府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所決定而且經同年三月十七日皇帝之特別上諭所宣佈的從莫斯科到海參崴的大鐵路計劃直接尖刻地改變了遠東之勢力對比。俄國不僅可以擺佈那幾萬的地方部隊了（且與供應給養的中央遠離），他可以把全俄陸軍任何一部調到那裏去，而且可以支配當地的那些毫無成見的羣衆。在整個十九世紀中，俄羅斯帝國在近東、中東與遠東很艱苦地匍匐了很久，一八七八年在近東停了腳，一八八五年在中東停了腳，現在一八九二年了，到了遠東了，他以打破紀錄的速度進行着那不可阻撓的運動，西伯利亞鐵路的築路速率超過了過去的一切路，他每年修築五百八十七俄里，到一八九五年已築成一千二百五十四俄里（註六）。俄國這項工程完全依賴於巴黎交易所的資金，與倫敦、紐約全無關係，所以英國與美國，不論他們國內及亞洲邊疆上擁有多少陸路兵，都不能直接阻止這種工程。只有日本，因為極端熱衷於大陸之擷取，還能企

圖於切實阻撓俄國之「控制太平洋上一切商業運動」之夢一般的前途，而且也還不遲。

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實於八十年代中預先演習過好多次了。這次戰爭即日本搶上風的企圖（註七）。這次戰爭打了一個國際的結頭，直到十年之後纔由浦茨茅條約把他解開。大家都知道，這次戰爭把遠東引進了歐洲列強世界政策之問題圈中。在戰爭進行中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地發現了下面幾件事：第一、中國全無軍事抵抗力，甚至逼近首都時都是這樣；第二、僅出兵七萬的日本之高度的戰鬪準備；第三、日本政府計劃之極端的大國派頭。他這計劃包括下列各點：一、在脫離中國的形式之下確立了對朝鮮之保護權（準備將來攫取）；二、在廣州、上海間之中國中部海岸建立大規模的軍事根據地以掩護那邊之經濟侵略；三、先攫取南滿海岸之全部，其中包括遼東半島，以準備佔有滿洲（註八）。

日本於一八九五年春季對中國提出的這些和平條件把歐洲音樂隊全體都引進中國「病房」中來了，他們準備了戰爭開始前即已提出的列強共同干涉。

據英國人看，日本之第二個要求是不能容忍的，因為這條要求使日本可插手於中國中部之英國「勢力範圍」。反之，以俄國人的觀點來看，日本南進於海必造成英、日的利益衝突而遠離了俄國之勢力範圍。英國也完全如此設想，他藉口於中國之過弱而想把日本留在朝鮮，這樣就可以同俄國糾纏起來而忽略了南方的行動。俄國雖也承認日本之第一項要求為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且戰爭正是因此而起，但是他卻想保障朝鮮之獨立（防日本），想由俄、日兩國共同保護此當時不能自存自立的弱國，而俄國如能在東朝鮮海灣佔據一個俄國久已覬覦

的海港當更能堅固此種保護權。最後說到第三個（關於滿洲的）要求。這個要求必使日本長遠地忙於北方的事務，這要求正合了英國的心思，他可給日本以實際的援助使他在滿洲築一個不可破的壁壘以抵抗俄國，並在那裏養肥日本。這裏就是英國態度的關鍵了，或是如金伯爵爵士於戰爭開始時所提議者來保障中國領土之完整（英國對於中韓宗屬問題還祕密幫助中國），或是答應日本之請求。反之，俄國方面，到了最後，使尼古刺第二不得不承認維特的意見，認日本之佔據滿洲是絕不能容許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將來更大的犧牲。可見那時維特已把滿洲看作殖民事業之必要的而且最鄰近的區域。他承認（一）滿洲將來可以抵償俄國爲着修築鐵路所費去而且要繼續耗費的浩大金錢（其中一部份是法國借款）；二、承認滿洲可以直接滿足法國資本之輸出傾向。維特那時正想吸收法國資本到烏拉爾以東來以繁榮西伯利亞各省以鞏固俄羅斯帝國之歐洲地盤，這地盤在一八九一年因新的饑饉而受了許多損傷。

一八九五年各國之壁壘就是如此分割了。美國從開頭即不與列強共同行動，他只依照朝鮮之要求而向中日雙方提出溫和的忠告。英國在開頭時，即日本的條件尙未宣佈時本與俄國一致，現在完全轉到日本方面去了，後來三個強國都幫中國的忙時，他就突然轉到消極方面。俄國自從知道了日本的條件之後，即準備立即與日本開戰。雖然英國還站在他這邊，他又向德、法兩國建議以最後通牒要求日本放棄滿洲。德國，這時很快地而且很熱心地把他的艦隊調來幫俄國的忙頗使俄國政府驚奇；但他把這事件當作他侵入遠東之機會，在這件事以前他都沒有找到佔得一個地位的機會。法國呢，他經常地搖動，觀望英國的態度，而且想引誘俄國從中國方面得到一